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1906-1908*

[法] 伯希和 著

耿昇 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1906—1908/ (法) 伯希和著; 耿昇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80253 - 688 - 3

I. ①伯… II. ①伯… ②耿… III. ①西域 - 游记 - 近代 IV. ①K928. 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12087 号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 (1906—1908)

作 者 [法]伯希和
译 者 耿昇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 13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49.75
字 数 69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688 - 3/K · 397
定 价 10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64892902@126.com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arnets de route

1906-1908

Paul Pelliot

Guimet, Paris
2008



伯希和、努埃尔与乌兹别克人在塔什干

護照

外務部

發給護照事准

大法國駐京大臣呂

函稱奉本國外務部咨稱茲有翰林院博學鴻儒

擬派名士伯希和帶軍醫員瓦陽及照相生共三人擬於十月由法起程取道

俄境薩木韃路入新疆適茲中滿昌海沙州等處赴京沿途考求古

蹟請繕給護照等因本部為此繕就護照一紙蓋印標硃訖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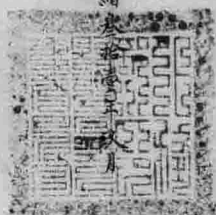
大法國呂大臣轉給收執所有經過地方官於該名士伯希和等持照到境時立即

查驗放行應約妥為保護毋得留難阻滯致干查究切切須至護照者

右給大法國名士伯希和

收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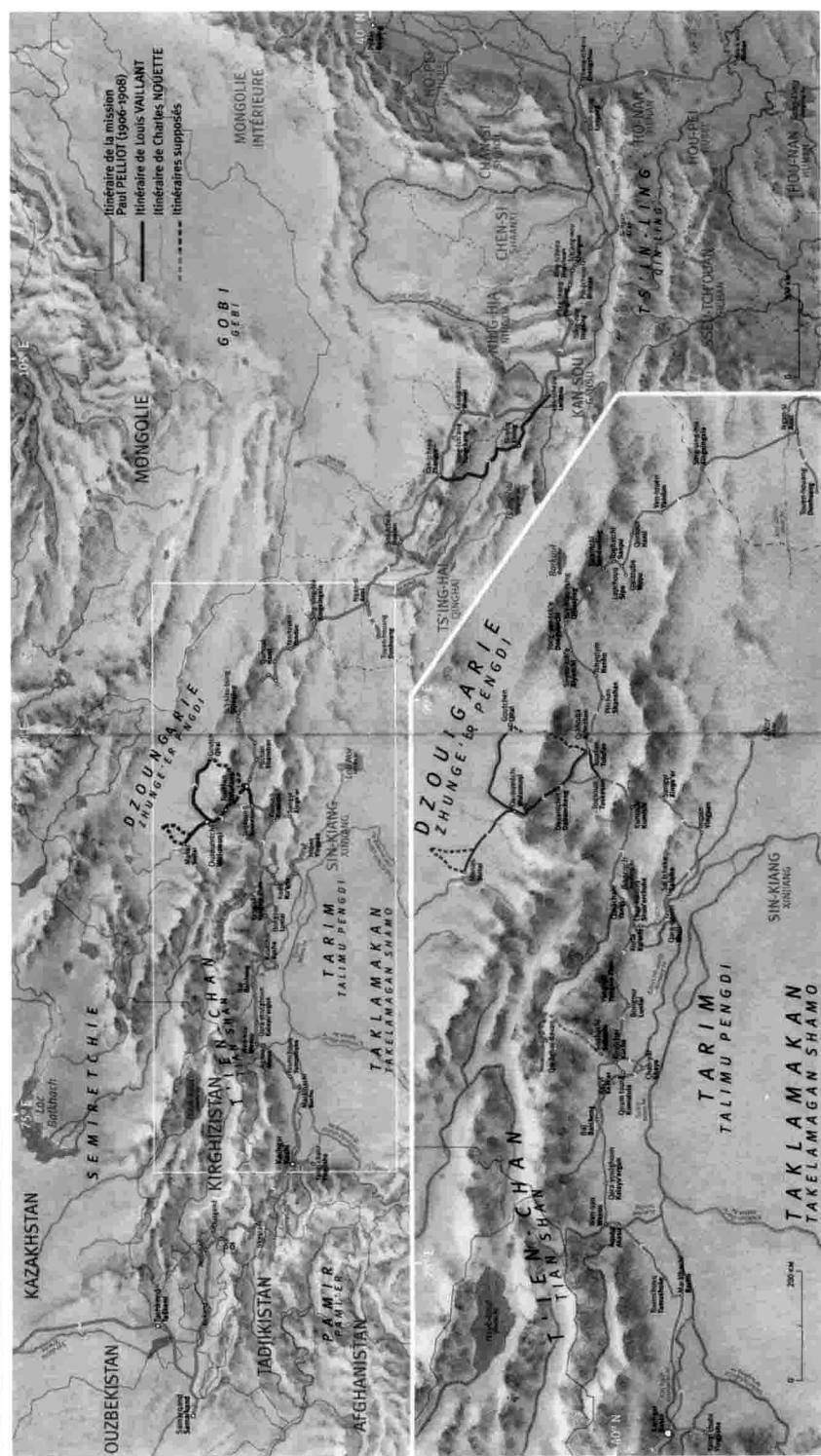
光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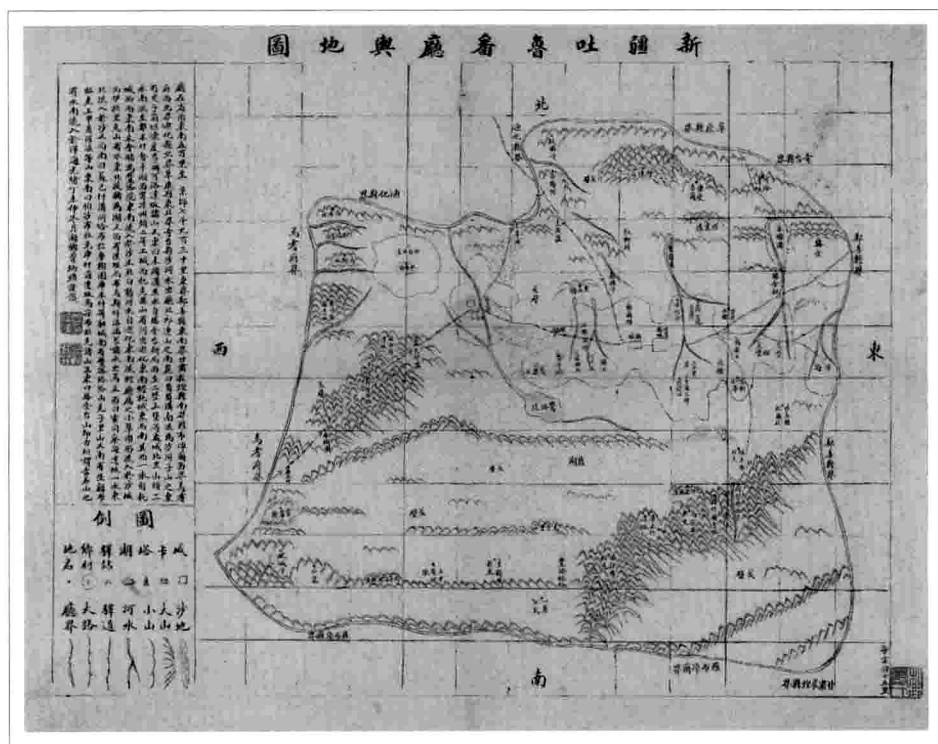
貳拾貳



清朝外務部发给伯希和等人的护照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7月16日自撒马尔罕出发至1908年10月4日到达北京的路线图



吐鲁番清朝官员曾炳煌赠送伯希和的新疆吐鲁番厅與地图

译者的话

1906—1908 年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 年）率领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对我国西域，包括今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宁夏等广袤地区作了科考探险，其中既包括地下发掘，也包括实地田野调查和翻检有关所涉地区的文献参考资料。有关这次西域科考探险的缘起、过程、成果以及后人的研究利用情况，笔者在拙作《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①里作了概述。伯希和的生平与学术成就，已由译者精选的多篇译文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②。笔者于此不再赘述。

伯希和的这次西域科考探险是由法国外交部、科学院、法国国民教育部、法国地理学会等科研和文化机构赞助的。其主要赞助人是色纳尔（Emile Senart）先生。考察团的成员主要是瓦阳和努埃特两位各司其职的专家。

伯希和率领的法国西域探险团具有明显的官方性质。它是根据西域考察国际委员会法国委员会经与其他有关国家的委员会协商后出面组织的，并且正式通知了中国政府以便获取签证并逐站地接待

① 耿昇：《伯希和西域探险与中国文物的外流》，载《2000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78—413 页。

② 伯希和等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59—469 页。

或给予帮助。资助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团的是法国外交部、科学院、国民教育部以及地理学会这些官方和半官方的机构。法国的奥尔良王子和罗兰·波拿巴王子都亲自出面支持。在伯希和一行回国后，于1909年12月10日，法国各界举行欢迎大会。法国内阁多个部门的主要阁僚、法国科学院和巴黎市的主要官员莅临，法国地理学会和其他各界名流济济一堂，热烈欢迎，美誉之辞不绝于口。由此而突显了伯希和西域考察探险团的官方或半官方性质。

法国政界与学界，选择伯希和主持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是一种很明智的选择。该探险团，实际上只有瓦阳、努埃特与伯希和三人，其余都是从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护卫、马夫、车夫、厨师、向导等），还有在不同发掘现场临时雇佣的民工。三名法国人，分工非常明确。瓦阳负责地理测绘、天文观察和自然史方面的工作，努埃特负责摄影、图片资料和档案保管。伯希和负责主持全盘工作，特别是对文物的现场搜集、田野调查、口碑调查和地下发掘等工作项目。这三个法国人要组织有时多达六七十人的民工从事田野发掘工程，还有对一系列事务性工作的处理，实在不算很轻松。一个学者，到另一个民族、语言、习俗、地理、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差甚殊的国家边疆民族地区，从事如此复杂的科考探险工作，必须有三大条件。首先是要熟悉所考察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再次是必须熟悉该地区的多种语言，最后是需要有高超的组织能力和良好的人际沟通关系。当然，我们暂且回避这些西方探险家盗窃中国文物的强盗行为不谈，他们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刮目相看。这些本来是文弱书生的人物，一旦进入探险科考地区之后，便立即进入“疯狂”般的亢奋中。伯希和之前斯坦因为西域“掏宝”，而丢掉几个脚趾。吕推为从新疆赴西藏的探险考察，而被当地山民打死在称多县并抛尸于通天河。古伯察为入藏布道天主教，与秦神父（他也被冻掉了几个脚趾）从今赤峰出发，经过蒙古多旗、宁夏、甘肃、青海而到达拉萨。他遭琦善驱逐后又从西藏出发，历经四川、湖北、江西、广东诸省而到达澳门，完成了一次“环中国”大旅行。大卫—妮尔作为一名巴黎上层社会的女子，用40多年的时间，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经南北两道而数次徒步入藏。伯希和传承了他们的探险精神。

伯希和时任当时尚设于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他

从很年轻时起，就是一名学贯中西的知名东方学家，也是当时法国少有的“知华派”教授，更是法国大学讲堂上的中国文明的宣教师。他在22岁时，于法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工作，恰逢义和团围攻外国驻京使领馆。他竟然不顾排外情绪高昂的义和团团民的围攻，赤手空拳地跑到大街上与团民大搞“武斗”，而且还夺取了一面义和团团旗，至今仍收藏在巴黎荣军院（残老军人院，Invalides），这就充分表现了伯希和的一种好斗精神。伯希和于1899年到达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当他1906年受命率西域科考察探险团出发时，他不但已经是一名颇有名气的汉学教授，而且还有望竞选法兰西远东学院的院长职位。但他放弃了这一切，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一项其前途未卜、成败难定和艰苦卓绝的西域科考察探险事业。这不能不说他是一名很有理想、很有魄力和很有毅力的人物。

西域探险需要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突厥语族诸语言（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蒙古语（特别是卡尔梅克语和硕特蒙古语）、梵语和其他的印度语言、阿拉伯波斯语、俄语，甚至还包括印支半岛上的某些语言。对于这诸多语言，伯希和有时是在途中边走边学习或进修的。伯希和本人实在是一个语言天才，他几乎精通中亚和东亚的所有语言。他的汉文化知识也较当时西方赴西域探险的其他人要精湛得多。我们从敦煌“劫经”过程便可以窥见其一斑。斯坦因作为一名资深的考古学家，对于汉文和有关历史知识却略显不足。他先于伯希和到达敦煌千佛洞，首先挑选的都是些整齐而又漂亮的文书。这从考古学观点上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这批文书大都是当地僧俗人士作为功德而向寺院供养的佛经写卷。伯希和挑拣的都是双面有文字和初看起来“破烂不堪”的卷子。其实，它们都是价值最大的社会经济文书（籍账文书、契约文书）和史地文书。伯希和对于有关的中国历史典籍的精通程度，连当时中国的大学者们，也都叹为观止，刮目相看，如王国维、罗振玉和沈增植等。

在人际关系方面。实在说，伯希和一生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到处挑剔别人的瑕疵，被人称为“找错先生”。他自诩为国际汉学界的“世界宪兵”。其学术权威与其跋扈行为一样令人震惊。他终生交友不多，树敌倒不胜枚举。他一生中学术成果累累，令人仰望。但他个人的名声，却非议甚多，他甚至还表现出一副十足的

“学霸”做派。在西域探险期间，他对其雇佣的当地服务人员吹毛求疵，处处指责，事事非难，便可见一斑。不过，他与瓦阳和努埃特的关系却尚称得起融洽，从而保证了其艰巨任务的圆满完成，促成了西域科考探险获得了丰硕成果。

由此可见，伯希和是法国西域科考探险团的最佳人选。正是由于法国政界与学术界作出的这样一种选择，才赌注般地使他们将大量中国文物劫持至法京。

伯希和一行是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的。直到1908年9月底，从郑州乘火车赴北京，共历时两年零三个多月。他于10月间到达北京；于12月12日到达河内，一直停留到1909年5月；然后又经过北京，停留四个月，于1909年10月从北京出发返回巴黎。连同伯希和在中国内地和其他地方的滞留，以及其行李文物运抵法国的时间在内，他们共用了近三年的光阴。直到1909年12月10日，法国各界才在巴黎大学阶梯大教室举行欢迎大会，这次西域探险才算落下了大幕，史称“伯希和三年西域探险”。

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团在我国西域地区的活动，主要分成四大块。该团从1906年6月15日从巴黎出发，于该年8月间，开始进入中国境内。他们首先在喀什地区，主要是在莫尔佛教遗址、三仙洞，特别是在图木舒克作考察和发掘。伯希和等人于1906年12月15日离开图木舒克，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绿洲。他们在库车地区滞留近8个月，其重点目标是苏巴什大遗址、都勒都尔—阿乎尔遗址和克孜尔千佛洞。尽管该地区已经被俄德日等国科考探险家捷足先登。伯希和探险团由此而产生了在库车地区的一系考古报告，诸如《都勒都尔—阿乎尔和苏巴什》（1982年，文字版和图版版）、《图木舒克》（1961年版，文字版与图版版）。伯希和一行于1907年9月3日离开库车赴乌鲁木齐，然后又到达吐鲁番地区。由于德国人已经在吐鲁番大举发掘过，故而法国人收获不大，主要是对吐鲁番的交通路线作了考察。伯希和对吐鲁番地区的考察结果，导致他后来写成了《唐代吐鲁番的道路》一书（作为伯希和遗作之一，于2002年出版）。由于伯希和在乌鲁木齐与清朝高官名流的交往中，获知敦煌藏经洞收藏敦煌宝藏之事，他们于是便匆匆忙忙向敦煌赶去。他们于1908年1月28日离开哈密，并于2月12日到达沙州。伯希和等人对整个敦煌地区，特别是对党河流域、西

千佛洞和榆林窟等作了考察。他们然后便进入了敦煌千佛洞（他始终称之为“沙州千佛洞”）。他们在敦煌千佛洞主要开展了四项工作：对石窟作编号，由此而产生了敦煌石窟的“伯希和编号”；对石窟内容（壁画、彩塑和题识等）作了记述和抄录，由此而产生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法国上个世纪80年代分6册出版，有笔者的中译本）及其《敦煌石窟图录》（6卷本，1920—1924年版）。至于伯希和在这些地点的具体考察过程、他们搜集到的信息资料和文献文物，在上述有关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档案文献的几部书中，均有详细记述。这几部书也都将陆续有译者的中译本问世，大家可以参阅。笔者于此就不再详细介绍了。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险团最重要的文献，也就是伯希和亲笔记述的《旅途中的笔记本，1906—1908年》一直未能公开刊布。2008年，为纪念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活动结束100周年，由法国的国家远东博物馆和伯希和西域科考探险的文物保管机构——集美博物馆负责出面，具体由该馆时任馆长的法国科学院院士贾立基（Jean-François Jarrigé）主持，最终出版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伯希和的这部日记并不像普通旅行家、探险家或一般学者们所作的那种游记，仅记述那些耳闻目睹的趣闻轶事。伯希和无论是在书信中，还是在日记中，记述的都是学术上的重要问题，很少有闲话和废话。他将田野口碑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以口碑补史料，以史料证口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只有像伯希和那样的大学问家才有可能，游刃有余，得心应手。

当然，西域科考探险也为伯希和带来了不胜枚举的荣誉与地位。伯希和自西域探险之后，于1909年10月24日返回巴黎，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为他专门设立了“西域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他在西域发现的文物，便是该讲座的主要教材。1921年5月6日，他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他于1927年还被聘任为法国高等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他于1928年任西方成立的第一个亚洲学会——法国亚细亚学会的副会长，于1935年任该学会代理会长，于1936年正式出任会长。伯希和于1940—1945年出任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他于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曾参加过西伯利亚战争，并出任法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他于1939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的通讯院士，此

前，他还分别被聘为圣彼得堡科学院和其他多个国家科学院的院士。他还先后出任过法国伊朗学会会长、集美博物馆董事会的董事长、东方之友协会会长。伯希和于1921—1945年间，任西方权威汉学杂志、法荷联袂主编的《通报》的法方主编。从此之后，足迹遍及全世界，讲学、访问和开会。1914年伯希和入伍时，作为联络官在达达尼尔海峡服役，然后又从那里赴北京。他于1921年到达波士顿、1923年到达伦敦，1925年到达开罗和俄罗斯，1926年到达纽约，1928年到达马德里，1932年到达乌普萨拉，1933年又到达北京，1935年重返中国和日本，1936年到达哈佛和伦敦。他于1940年最后一次到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参加美国太平洋研究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会。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期间，伯希和忧国忧民，心情不好。1945年，德军撤退时，伯希和已经罹患癌症，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还在自己任馆长的德纳里博物馆，升起了第一面法国国旗，足以表现其爱国精神。1945年10月26日，由于癌症的一次大出血，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67岁。

伯希和是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典型的汉学家。当时的中国，已处在“国破山河碎”的衰败时代，而西方列强却进入了先进发达的现代社会。伯希和于其言情意表之中，屡屡暴露出某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也难免沾染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的轻蔑心态。他有时也会讲一些刻薄的讽刺和污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新疆人）的言语。他对于中原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共生共存和荣辱与共的关系，有时也出言不逊，略有挑拨之嫌。这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弱国很难争得全面的尊严，贫困也会遭人欺。我们对此应有一种客观的和历史性的评价。为了保持此书的原貌，译者还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这一切。因为这部书必定是国际汉学界的经典。具体应由广大读者去评论是非，指点功过吧。译者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保有批判的态度，但从全面来看，伯希和是中国文化的崇拜者，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虽有批判，但更多的则是给予肯定和褒扬。伯希和对于中国文化的西传，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伯希和这部日记的学术价值非常高，对于我国西域史研究颇有裨益。对于我国的敦煌学、突厥学、西域史地、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均有参考价值。

《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洋洋 70 余万字，始于 1906 年 7 月 15 日的撒马尔罕，因为他是经过俄方同意进入中国的；结束于 1908 年 10 月 1 日的郑州，因为当时郑州是京汉铁路线的中转站，也是从陕西东行时经过的最近的火车站。此外，书中还附有伯希和于这次探险期间所写的信件（实际上是向法国所作的书面报告）。这批信件，大部分是致伯希和探险团的发起人和赞助人、法国地理学会会长色纳尔先生的。这些信件也都是“学术信札”，每一封相当于一篇科考探险日记。这些日记与书信互补互证，角度不同，详略各异，反映了当时中国西域的整体面貌。

当然，伯希和的日记正如本书法文版的书名《旅途中的日记本》所说明的那样，仅仅是一部日记，伯希和原来并未打算公开出版它，而仅供自己参考使用；或者是在将来出版时再作润色、核查和考证。所以其文中有些文字欠推敲。特别是有些专用名词的拼写法很不统一，同一个民族名称、地名、人名出现了多种异体写法。由于伯希和在途中，未曾携带充足的工具书，所以他于其中介绍的历史典故，也有许多不确切之处。此外，伯希和当时还很年轻，他的 28 岁生日是在库车度过的，而 29 岁的生日正是在敦煌千佛洞度过的，故而他在学术上还没有达到其晚年的那样炉火纯青的程度。但是，伯希和于 100 多年前提出的学术观点，有许多是他的首创，都被后来的科学研究证明是正确的，经受住了历史考验。

译者于 2011 年到法国时，由夫人万明教授陪同，几经辗转，多处奔走，才成功地购得了此书的法文版。回国后，译者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笔耕不辍，白日伏案涂鸦，夜间灯下码字，才将此书译作汉文并在中国出版。这既为国内广大读者，为中国的学术研究作一点绵薄贡献，也为中法文化交流添加几块砖瓦。此书的翻译实在是难于上青天。其中最大的难度是地名的核查，几乎每个地名都需要翻阅大量方志与地图。有时一整天也只能解决一两个地名的译名。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和杂居地区，其地名极其复杂，有汉文、古塞族文字、突厥语族文字（维吾尔文、柯尔克孜文、哈萨克文和乌兹别克文）、蒙古文、梵文和其他印度文字、阿拉伯—波斯文（特别是塔吉克文）等等。在伯希和那个时代，这些语言的拉丁字母转写体系尚未最终确定；特别是汉语拉丁拼音，更未形成固定的体系。更为麻烦的是，新疆的地名又多有变化，同一个地